

● 中华全景百卷书
瑰宝系列

80

中国瓷器

钱 治

● 中国书画出版社



2228
2228/337.8
357.811

中华全景百卷书



○瑰宝系列○中国瓷

钱
治

京华出版



(京)新登字 2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全景百卷书:瑰宝系列/朱新民主编. —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4.10

ISBN 7-80600-045-3

I. 中…

1. 朱…

Ⅱ. ①普及读物,综合性-中国②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①Z228②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2290 号

中华全景百卷书

瑰 宝 系 列

※

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

京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张自忠路 3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腾飞胶印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3.75 印张 521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0-045-3/Z·3 (71-80)定价:40 元

《中华全景百卷书》

编委会

顾问: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

苏 星

总编委会主任:李志坚

总编委会副主任:何卓新 孙向东

总编委: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 伟

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晓山	于振华	马艳平	王 红	王 伟
王 勉	王士平	王尔琪	王奇治	王品璋
王恩铭	王寅诚	王骊岭	区界名	石建英
卢云亭	田人隆	申先甲	刘 达	刘 彪
刘文彪	刘克明	刘树勇	刘振礼	刘俊华
刘峻骧	刘森财	成绥台	孙玉琴	孙彦钊
邢东风	李元华	李明伟	吕品田	吕金陵
朱立南	朱祖希	朱筱新	朱莱茵	朱深深
伍国栋	华林甫	向世陵	杨菊花	吴舜龄
宋志明	宋剑霞	忻汝平	汪家兴	张 正
张亚立	张兆裕	张则正	张鹏志	陈晓莉

陈绥祥	陆道中	武 力	武玉宇	赵艳霞
罗静文	周 亮	周育德	金启凤	金奇康
金德年	金德厚	宗 时	空 宇	郑玉辉
郑进保	泽 昌	胡 洁	胡振宇	郝 旭
春 晖	钟 玉	郭文杰	郭积燕	郭素娟
袁济喜	夏继果	徐兆仁	徐庆全	钱 冶
唐 忠	梁占军	涂新峰	黄同华	曹革成
蒋 超	葛晨虹	鲁 藏	焦国成	曾令真
谢 军	郝爱红	裴仁君	熊晓正	戴瑞丰

※

※

※

总策划·总编辑：朱新民

执行总编辑：傅亿仲

副总编辑：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昌

装帧设计：王 晖 尚云波

编辑人员：董凤举 曹革成 孙建庆
鲁 藏 戴瑞丰

主旋律的音符

(总 序)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主旋律”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而策划的。这是一套综合性强、品味高的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是一所浓缩的爱国主义图书馆。它由100卷分10个系列构成。在明理、知事、动情、养成的四个环节上，用100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全景式地勾勒出祖国的古往今来和大好河山；用100个韵味浑厚的音符，合奏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下，由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由100名专家分卷撰写而成，经首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建国45周年之际，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中华全景百卷书》异彩纷呈，正所谓开卷有益。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当今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古人云：知天下事，读五车书。

我们说：读百卷书，激爱国情！

一、概 说

关于中国瓷器的发明及起源时期、地域,目前国内外陶瓷界还在探讨,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早在 3000 多年前的商代,在长江中下游及江浙地区就已出现了原始青瓷;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才有青瓷出现,并很快就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秦汉时期,由于与罗马及东欧诸国的交往,受玻璃工艺传入的启发,而发明了各色釉料,在中原地区才有了现代严格意义的瓷器。无论如何断代,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 中国瓷器的起源与发展

瓷器的起源,无论如何去断代,一定是经过了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而这其中,肯定受到了陶器的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瓷器与陶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主要在于:陶

器的胎料是普通的粘土,而瓷器的胎料是瓷土(高岭土);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 900℃左右,而瓷器的烧成温度则在 1200℃左右。同时,陶器不施釉或施低温釉,而瓷器则多施釉,且高低温釉都有;再者,陶器胎质粗松,断面吸水率高达 3%以上,而瓷器胎质坚密,断面吸水率在 0.1%以下。这就说明,瓷器是经过精心选料、严格控制工艺过程,才能制造完成的。

根据考古发现,我国早在一万年前就已经烧制和使用陶器了。我们可以想象,原始祖先在制做陶器时,首先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同时又便于制造。因而就地取材、就地搭窑烧造。而当时,工艺非常之简单,窑坑也非常简陋。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做到严格控制窑温。因此,就会由于偶然的原因(原料、温度合适),烧出了一些理化指标接近瓷器的器物。于是出现了原始青瓷。人们发现,这一新的东西,远比陶器好得多。经过漫长的岁月,人们在原料选择、研磨、淘洗、成型、表皮处理、装饰以及烧成方面,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改进创新,才最终完成、定型了瓷器工艺。

从各地出土的商代至战国时期的大量原始青瓷看,正反映出了这一探索过程,从偶然到有意识地制造。年代越久远的,其工艺愈粗糙,造型愈简

单,图案、纹饰愈单一,且釉面厚薄不均匀,并有非人为的流釉、缩釉、短釉现象。

商代原始青瓷常见的器形有尊、罐、甗、瓮、钵、簋和豆等,图案、纹饰主要为几何形,如方格纹、云雷纹、锯齿纹、网纹和弦纹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器形逐渐增多,除了一般饮食用具如碗、盘、钵、盂等,战国时期模仿青铜礼器的钟、鼎、簠等,尤为精致。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原始青瓷龙首鼎,釉色青黄,鼎身四周刻划弦纹、斜线纹及涡纹,鼎口一面饰一长颈龙首,一面为一小兽形尾,旁安长方形立耳,下为三矮兽足,此鼎造型别致,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器物。

从原始青瓷出土的地区看,分布虽然广泛,但这也正反映出了其制造的随机性和无序状态。出土物件仍然带有很大的原始色彩,还没能完全摆脱掉偶然性,因此还不能把它断定为现代意义上的瓷器。

到了东汉晚期,瓷器的制造才进入到了成熟期。其标志,一是在烧制过程中,完全摆脱掉了偶然性,能人为地、有目的地进行有效的控制;二是能大批量地进行烧制。对出土的东汉晚期瓷片标本进行测试和化验结果表明,烧成温度已达 $1310^{\circ}\text{C} \pm 20^{\circ}\text{C}$,胎体完全烧结,吸水率为 0.28%,

抗弯强度达 710 公斤/厘米²，胎料氧化铁含量为 1.64%，已达到近代瓷的标准。而在浙江、宁波、上虞、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瓷窑遗址。同时这一地区的产品，在江苏、河南、河北、安徽、湖南、湖北等地区的汉代晚期墓葬品中都有发现，说明当时的产量较多，销售地域也已相当广泛。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一些地区中还发现了黑釉瓷器，这为瓷器的发展，无疑开辟出了新途径。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文字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瓷”字（在晋代吕忱的字书《字林》中）。此前，东汉许慎编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并没有“瓷”字。这说明东汉实际生活中没有这个字，那么瓷器在当时也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物品种类。但有些同志认为，1972 年至 1974 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初年软侯利苍及其家族的三座墓中出土的一大批木简和竹牌上，都发现了用墨笔隶书的“资”字。如：

1. “酱一资”（简 106）；
2. “盐一资”（简 104）；
3. “鱼鲑一资”（简 90）；
4. “元霉（梅）二资”，（简 139）；
5. “米酒二资”（简 111）；
6. “白酒二资”（简 108）。

这些“瓷”字，就是瓷字。在这里，我们不否认这些“瓷”字的含义。但是这也正说明了，当时人们对瓷器认识的不确定性。而正式定名为“瓷”，则说明了人们对这一物品认识的确定性，同时也说明了，瓷器已大量生产，成为了一种独立稳定的品种。南京赵士岗墓出土了一件“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作”款铭虎子，刻有制作工匠的名字，说明当时制瓷已成为专门职业，并形成了一支规模不小的专业人员队伍。

这一时期，制瓷工艺也有了发展，出现了釉下彩瓷器。在造型及装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到了北朝时期，白瓷作为瓷器一个新品种也出现了，可还不是成熟的白瓷。但说明当时制瓷的工匠们，已开始掌握控制胎料及釉料中的含铁量技术了。

到了隋、唐、五代这一时期，我国制瓷业终于达到了其完全成熟的阶段，并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

隋末大运河的开通，使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更趋便利；而唐代的社会安定、经济的繁荣，以及对外贸易的发达，这一切都为中国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条件。五代十国时期，虽然中国重又陷入封建割据的局面，这在一定条件下限制

了制瓷业的整体发展,但又使各地区的制瓷业有了各具特色的可能,出现了如“秘色越器”的“秘色瓷”。

近年来,在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四川、湖南等地都发现了隋代窑址。这一时期,瓷器生产主要以青瓷为主流,但白瓷生产也具备了一定规模。由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张盛墓、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西安郭家滩墓、姬威墓等出土的一批白瓷器物看,则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唐代,逐渐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南方地区多产青瓷,而北方地区白瓷的制作逐步取代青瓷生产。但青瓷在整个瓷业中仍占主要地位。当时的越窑青瓷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越窑的主要产地在浙江上虞、余姚、慈溪一带。此地区原为古越人居住地,战国时属越国,秦汉至隋属会稽郡,唐代改为越州,故这里的瓷窑统称越窑。白瓷是以河北内丘境内的邢窑白瓷最具代表性。

五代时,越窑烧制出了史料文献中所记述的“秘色瓷”。所谓“秘色瓷”是指瓷胎细腻质密、胎色浅灰、胎壁较薄、釉层匀净光滑、呈半透明状、釉色青碧或青黄。它完全不同于青瓷与白瓷。之所以称之为“秘色”,就在于当时仅越窑地区掌握其烧制工艺。但这也正说明了当时瓷釉的着色剂打破了

仅为青、白的局面。

唐代中期以后,出现了釉下彩、釉上彩瓷器。从长沙窑的出土瓷片标本看,是以铜作为高温着色剂应用到瓷器装饰上的。这是中国陶瓷史上又一项重大发明,为我国陶瓷装饰开辟了新途径。同时,唐代还创烧了一种在黑釉、黄釉上用天蓝、乳白、褐绿色彩斑做装饰的花釉瓷。

至公元960年,宋代结束了分割混乱局面,中国重又实现了统一,致使瓷器的发展又进入了新的高峰期。当时,名窑备出、争奇斗艳,最著名的有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产品各具特色,充分显示了宋代制瓷业所取得的成就。

定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一带,宋属定州,故称定窑。其是继唐邢窑之后兴起的白瓷窑体系,以盛产白瓷著称,由于瓷质精细、纹饰秀美,曾被选为宫廷用瓷,产品风靡一时。其在工艺上及装饰技法上都有创新。

汝窑在今河南省宝丰县,宋属汝州,故名汝窑。该窑产瓷以青瓷为主,曾一度为宫廷用器。据文献记载其“内有玛瑙为釉”,釉色呈淡淡的天青色,釉面开细密的纹片,不同于其它青瓷。汝窑瓷器极为珍贵,出土及流传至今者仅百余件。

官窑专指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和南宋

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此窑专烧宫廷用瓷，器身开纵横大块纹片，并有“紫口铁足”特征。这一特征是其创制。

哥窑，窑址至今尚无定论。但其在中国陶瓷史上一向享有盛名。据传为宋代浙江龙泉章氏兄弟所创。其器通体满布开片，大小相间，大片呈铁黑色，小片呈金黄色，有“金丝铁线”之称。同时工匠们还掌握了开片原理，有意识地创烧出了有“紫口铁足”特征的瓷器。

钧窑在今河南省禹县，是在唐代花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与汝窑有密切关系，历来有“钧汝不分”之说。其创制的窑变工艺独具特色。

此外宋代还有，如耀州窑、临汝窑、磁州窑等民窑体系。在工艺及装饰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

此时，值得一提的是，在景德镇窑，创烧出了一种釉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的、独具风格的青白瓷，即后人所称的“影青”。其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的胎、釉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半透明度，使我国瓷器烧制水平又提高了一大步。同时，为日后景德镇成为我国青花瓷器制烧中心奠定了基础。

而辽、金两代瓷器则除独具地方及民族特色外，在工艺上也有所创新，如“涩圈”，则为当时特

殊工艺留下的印迹。

到了元代,从整体上讲,制瓷业并未突破前代的成就。但在景德镇设立的“浮梁瓷局”及创烧的卵白釉瓷,特别是青花瓷的逐步趋于成熟及釉里红的初步创烧成功,确实为后代的制瓷业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

从1368年明朝开始,我国制瓷业达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不仅使景德镇发展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同时,青花瓷、白瓷、彩瓷及单色釉瓷等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并且在对外文化交往上,也突破了前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不仅瓷器品种多、产量大、工艺精,同时,造型及饰装手法也都有非同寻常的建树。并且在窑炉的革新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得官窑、民窑都颇具规模。在《天工开物》中就列举了制瓷生产过程,有舂土、澄泥、造坯、汶水、过利、打圈、字画、喷水、过锈、装匣、满窑、烘烧等各道工序,从原料开采到烧制成器,“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还记述了生产规模,“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在《二酉委谭》一书中还描述了当时的生产景象,官窑和民窑数百个烟囱昼夜红焰蔽空、烟火相望,“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

天，夜令人不能寝”。由此可见当时的盛况。

这一时期最具成就的代表性瓷器有，青花五彩瓷器、斗彩瓷器、素三彩瓷器、甜白及象牙白瓷器等。

公元1644年，清王朝统一全国后，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制瓷业的发展。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中国古代制瓷业达到了顶峰，此后则逐步走向了衰落。

这一时期，由于中外文化的进一步交往及国家的稳定，吸收外来原料及技法并融汇传统工艺，使得中国制瓷业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进入了我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

在康熙时期，由于恢复了官窑生产，使景德镇制瓷业的制作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创烧出了粉彩及珐琅彩等独具特色的彩瓷。并在前代的基础上，使青花瓷、五彩瓷、三彩瓷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还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铜红釉烧制技术。

雍正时期，瓷器以精细著称于世，并使创烧于康熙朝的粉彩瓷、珐琅彩瓷更趋艳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使青釉的烧制达到完全成熟阶段，出现了豆青、冬青、粉青等多种品色。

到了乾隆时期，景德镇荟萃了一代名师巧匠，在前朝工艺的基础上，彩瓷和单色釉瓷的制作，无